

# 郁達夫遇害謎底

吳文蔚

## 離愁慶慶魂夢搖搖

筆者近讀美，梅其瑞在「郁達夫遇害之謎」一文裏，結論爲：

一、郁達夫確是日本憲兵殺害的。  
二、郁達夫不純粹是一個愛國者，因爲他有親日成分，他的作品浪漫，他反覆無常，他有間諜身份，因而致死。

三、他晚年生活安逸，他待人誠懇，樂於助人，保持有鄉下土紳士地位，使他此生愉快滿意。

以上這三點，是否便是名作家郁達夫一生的結局和蓋棺定論之論，於此且看劉心皇的「郁達夫與王映霞」一書，以作較量，劉君此書不能說是對郁達夫一生資料都很完全，但在現在還沒發現一本完整的郁達夫傳記以前，這本書可以說是比較可觀的了。尤其附錄裏的「郁達夫在南洋」一篇，對「郁遇害之謎」，雖未蒐集到最「確定資料」，但謂郁之死於日本憲兵之殺害，當無可疑也。

在這裏光引介「郁達夫在南洋」一篇的「小引」，以作對於瞭解郁達夫的一個梗概。這小引原文是：

「郁達夫天才橫溢，文思奔放，在新文學運動的前期，對於讀者的影響，是很大的，對於後來的作品——小說、散文、遊記等等，也都有深刻的印象。

「他的坦白暴露自己的寫法，當時，令人耳目爲之一新，於是，他的文名，不僅在國內很響亮，而且還遠揚於國外。

「郁達夫在抗戰軍興之後，適遭逢「家庭事變」——其妻王映霞竟有了「情人」，他們夫婦之間，從此便糾纏不清了。郁達夫一氣之下，答應了星洲日報的聘請，要去南洋「作海外宣傳」了，這是民國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冬天的事，誰知郁達夫這次的「去國」竟是「一去不返」了呢！」

究竟他去國之後，生活情形怎麼樣？作了些甚麼事？郁達夫在南洋的友人，爲他編的「集外集」，「郁達夫紀念集」，「郁達夫南遊記」等

書，敘述他在南洋的情形很詳細，這一段「小引」，可以說是對郁達夫自留學歸國寫作成名以迄參加抗戰與赴南洋去國前的前半生概述；「郁達夫在南洋」，那就是對郁達夫自到南洋以迄第二次大戰結束時，郁達夫不幸遇害和遇害後南洋文化界對郁氏的哀念和追悼，是郁氏後半生的情形。對於郁達夫一生的評論，有其相當的正確性，決不像「郁達夫遇害之謎」的作者，把郁氏評爲反覆無常，與日本妥協——親日，並不是一個特別愛國者的那麼含糊，在這裏我願把「郁達夫遇害之謎」的作者在其文中所述關於郁氏生前的生活背景立場等情形，在劉文中可能引證的特摘錄下來，作一嚴正的較量：

劉文「郁達夫在南洋」——三、「初到南洋」：民國二十七年冬（一九三八）郁達夫「決心去國，上南洋去作海外宣傳」。其實，是他家庭發生「事變」，王映霞的情書被他無意中尋到，證明他事前聽到的謠言，都是真的，遂有「九洲鑄鐵終成錯，一飯論交竟自媒」的詩。並且註云：「映霞

失身之夜，事在飯後，×君信中（即三封信書之一）敘述很詳。……他再回福州時，苦悶異常，便到裴仙廟裏拜菩薩求籤，以求安慰。誰知他求到的一張籤，竟是：「曳尾泥塗」，下面畫着一隻「龜」，他不但沒有得到安慰，反而更難過了，於是又到王靈官廟裏求籤，那首詩籤是：「寒風陣陣雨蕭蕭，千里行人去路遙，不是有家歸不得，鴟鳩已佔鳳凰巢」。所以他在「毀家詩紀」中有「曳尾塗中當死」的辭句。他是「看得開」，「放不下」的人，他頓覺無面目在國內「混」了，郁於十月十二日，從福州揚橋巷寄給「苦瓢和尚」的兩首詩是：

一、「離愁感盛走天涯，聞道南台又駐車，亂後倘逢應失笑，一盤清賬亂如麻」。

二、「莫憊泥塗曳尾行，萬千恩愛此時情；念家山破從何說，地老天荒曳尾生」。

郁達夫去國之前的心情，真是恩怨怨，加上離愁別緒，實有莫可奈何之感，所以要走煙荒、要用「五湖煙水洗恩仇」，而後還希望「亂後相逢」呢。

當時郁達夫攜王映霞及其子自福州起程，經香港而到南洋，這個經過，他在「檳城三宿記」中曾說：

『回想起半年來，退出武漢，漫遊湘西贛北，復轉長沙，再至福州而住下。其後忽得胡氏兆祥招來南洋之電，匆促買舟，偷渡廈門海角，由香港而星洲，由星洲而檳嶼，間關幾萬里，閱時五十日，風塵僕僕，魂夢搖搖，忽而到這沉靜、安閒、整齊，舒適的小島來一住，真像是在做夢』

』，又說：

『此番之下南洋，本來是為星洲日報編副刊來的，但是十二月二十八日到星洲，兩日過後便是新年的假日……』

這個「十二月二十八日」（二十七年），是他到南洋的日子。他正抱定「作海外宣傳的目的」，預備作一番海外的文藝播種工作，這在他正是個值得紀念的日子。可是，誰能想得到從這一日開始，他是永遠的去了呢？永遠的不能返國了呢？

他的恩怨怨，也永遠的不能報了呢？上帝對這一個有才情的文人，未免太殘酷了吧？

### 世亂年荒鴛侶參商

郁達夫到南洋之後，擔任「星洲日報」副刊「晨星」的主編，還兼主編「華僑週報」、「星洲半月刊」和「星洲畫報」。王映霞則主編「星洲日報」的婦女版，他們卜居在新加坡中崙魯的一所樓房。當時海外文壇起了很大的波浪，「無數仰慕他的青年都因他來，增高了寫作興趣和信心」。加以他感人的作風，一經和他接觸的青年及文藝工作者，都對他有極好的印象。證諸後來得悉他「被難」時的哀悼，和編印紀念性冊子之多，便確定了他在星洲是成功的。

以上所言是郁達夫去國原因以及經過情形，由此足可證明郁達夫之去國，不是別的原因，更沒有政治的背景，他純粹是一個愛國者，正圖為祖國獻身抗日禦侮的民族聖戰的國難時期，忽然家庭發生了事故，而且又是一種「緋聞」，使得

他無面目見人而不能在國內混下去。但在「郁達夫遇害之謎」文內，作者引述的：「過去在武吉丁宜憲兵分隊服務的人——其中十個人最重要的陳述——這十個陳述中之一的第九位，E先生的（過去在武吉丁宜憲兵隊工作）敘述後，作者忽然用「同時」，以「鈴木得到F和G的證言」作以下「八點定論」便不能不令人有很大的懷疑。E先生的敘述原文是：

「我從一九四四年六月到戰爭為止，在武吉丁宜憲兵隊，過去我是在近衛兵（皇軍守衛），後來派為武吉丁宜憲兵隊事務要員，我管理販賣部和憲兵隊伙食，常到巴爺公務去購買燃料，總受到趙先生的優厚招待。他像位鄉村老師，聽說他會十三種語言，所以我想他不是個平凡的人。第一次是其他憲兵帶我到他家，他們說他過去當過通譯，因此和憲兵隊關係很近。他屋子中間放個大桶，裏面放了黑砂糖，發酵後製成酒，他給了我們一些喝。」

「在戰事完結後兩個月，我去巴爺公務買燃料，我去他家，適他不在，我就留了個便條，謝謝他多方面的幫助和照顧。並向他辭行，告訴他要歸國。一個月後，我聽到傳言，他被日本憲兵殺害。想到我留給他的條子，內心萬分不安」。

E先生這段敘述本來是很正常的，接下去便該引述第十位的陳述了，但作者忽然在此轉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灣，用「同時」二字，又以「鈴木得到F和G的證言」，節錄下面有關係的八條為「定論」。這八條是：（一）他（指郁達夫）的教育背景：留日外國學生，東京帝大法學部

畢業，(二)參與中國政治時，他加入共產黨，(三)由於他是共產黨，身份危險，所以逃到新嘉坡，成爲活躍的新聞記者，(四)當日本佔領新嘉坡時，他感到危險，逃到蘇門答臘島的巴干格魯，當日本人佔領此地時，他被逮捕。(五)被捕後要處刑，因爲他會七國語言，包括日文，所以軍隊認爲：一方面監視他，同時留他在憲兵隊當通譯員，比處他刑罰，對日本更有利益。一九四三年二月底左右，他本人要求停止翻譯工作，憲兵隊就釋放他，(七)釋放後，他在巴爺公務製酒和賣酒。(八)戰後他失蹤，詳情不清楚」。

這八條可以說是對郁達夫作了一個未判決的定論，尤其(二)、(三)兩條，真可謂毫無常識，不知離事實有幾千里遠，作者以「鈴木節錄」作爲引證，亦實在未曾稍作半點思考，太出乎常識而無半點人情味了。

在劉文中把郁達夫的去國之情，敘述得極真實而又詳細。而「郁達夫遇害之謎」的作者，在此八條中，竟把郁之去國，說成了「參與中國政治時，他加入共產黨；由於他是共產黨，身份危險，所以逃到新嘉坡，成爲活躍的新聞記者」等等，這兩點真是滑稽透頂，信口雌黃，不着邊際了。

郁達夫之實際參加中國政治，是起自「福州之行」，他在福建省政府任參議，是民國二十五年年的事，我們且看郁達夫的閩遊日記：「一九三六年二月，在福州。」

「二月一日，星期日，大約係舊曆正月初十，天氣晴爽；侵晨六時起床，因昨晚和霞意見不合，通宵未眠也，事件的經過是如此的，前月十五

日——已逼近舊曆年底了——福州陳主席公洽來函相招，謂若有閩遊之意，無任歡迎。但當時因羅秘書貢華，戴先生，及錢主任大鈞（慕尹）等，隨委員長來杭，與周旋談飲，無一日空，所以暫時把此事擱起。至年底，委員長返京，始匆匆作一陳公覆函，約於過舊曆年後南行，可以多看一點山水，多做一點文章。舊曆新年，習俗難除，一日捱一日的過去，竟到了前晚；因約定的稿子，都爲酬應所誤，交不出去，所以覆急勸我行，並欲親送我至上海押我上船；我則猶豫未決，並也不主張霞之送我，因世亂年荒，能多省一文錢，當以省一錢爲得。爲此兩人意見衝突，你一言，我一語，閑吵竟到了天亮。」

「既經起了早，又覺得夫婦口角，不宜久持過去，所以到了八點鐘，就動身跳上了滬杭火車；霞送我上車時，兩人氣還沒有平復。直到午後一點多鐘，在上海趕上了三北公司的靖安輪船，駛出吳淞口，改向了南行之後，方生後悔，覺着不該和她多鬧這一番的。」

「晚上風平浪靜，海上月華流照，上甲板去獨步的時候，又殷殷想起了家，想起了十餘小時不見的她」。

### 蓬首汗顏兩眼起霧

這是郁達夫在閩遊日記中，第一篇記他去福建的情形。當未起身前，許多國民政府的高級官員，而且都是些重要人物，日和郁氏談飲，可見他們的私交是相當的不壞，在這種情形之下，郁達夫到了福州，實際參加了政治，無論如何，是不

會抽出身來去參加共產黨的。況且這時候的郁達夫，已經是四十開外的人了。難道他連這一點利害輕重還不懂嗎？這時候，他把許多國民政府的高級官員丟下去參加共產黨，別說份份上不允許，就是在常識上也是萬萬不可能的。任何人不會在同一時期去參加兩個政黨的，何況是面臨國難時期，國民政府又是執政黨，一黨繫國家之安危，郁達夫是一個愛國者，他的目的是解除日本軍閥的對華侵略，而不是藉抗日而發展什麼政黨，說他實際參加中國政治時，又參加了共產黨，未免太過天真而且無常識是毫不過份的。如果說郁達夫在創造社時期參加過共產黨，倒還可以勉強，若說他到福建實際參加政治時，又參加了共產黨，這話不但離常識過遠，而且幼稚得令人好笑！這是不值一駁的事。

至於說「郁達夫是共產黨身份，因危險在國內混不下去才逃到新嘉坡」一節，更是無稽之談了。當抗戰開始時，毛澤東是打着陽奉陰違的旗號，擁護蔣委員長，參加了政府的，明白些說，就是「國共合作」，共產黨在重慶設有辦事處，新華日報是在重慶發行，軍事委員會政治部部长是陳誠，副部长是共產黨的周恩來。那時郭沫若担任政治部第三廳長，郭沒有危險而能在軍事委員會內作事，難道郁達夫就有危險而要逃往新嘉坡嗎？看完了以上筆者所舉兩點，便可以知道郁達夫去南洋，沒有別的，其主因，就是爲了「家庭事變」，再無面目見人而下決心去南洋。「郁達夫遇害之謎」的作者，對於這一點，是太不明白，太不瞭解了。一個作家評判一個人，在事情未判清

楚之時，即下筆作定論，是有損私德，這要對歷史負責任，是不能够信口開河，說了就算了！

「郁達夫遇害之謎」的作者，在引用一些日本人的敘述之後，他歸納了八點作結論，他在第八點之後又強調說：

「只有第六點——他與日本人之間的親密關係，新增加一項我們對郁在蘇門答臘生活的了解，進一步。這點又再引起同樣的老問題：郁到底真正和日本人合作到什麼程度？」

關於這一點，郁達夫遇害之謎的作者作此疑揣式的定語，確實是太不忠厚，同時也太無常識，對郁達夫一點也不瞭解，同時也可說是對郁達夫的一大侮辱！對郁當時的處境，似乎毫無用了半點思考——作者似乎即不曾想到郁達夫當時的處境，是在日本人的勢力控制的範圍之下，一個身處敵人勢力範圍下的人民，你除了聽敵人的擺佈，逆來順受，表露親善。凡事笑臉迎人之外，試問還有甚麼辦法？郁達夫此時是在南洋的淪陷區內，是在日本軍力佔領之下，當然此時的南洋社會，一切都是日本軍人的天下，既然是日本軍人的天下，日本軍人到你家裏走走，你還敢不獻出滿腹的熱誠去和善的招待嗎？所謂：（第六點）「各種各樣的日本人——平民、政府官員、軍人、憲兵，都尊稱他為趙先生，同時和他關係親近」也者，也不過是郁達夫在此情形之下，處於無奈而已，怎麼即能憑此一點，說到「郁到底真正和日本人合作到什麼程度」的話呢？！關於這點，在劉心皇文「初到南洋」文內曾說：

「郁達夫的『家庭事變』之後，精神上受的

打擊很大，不得已才投荒到這熱帶來，他情緒的低落，意態的消沉，是可想而知的，這時，有人在南洋周刊上寫文章責難他，罵他落伍，譏他為逃難作家，郁達夫寫了一封公開信作為答辯，信中說明自己只是一個作家，而不是戰士、態度十分謙遜，一點火氣都沒有，很有學者文人的風度。得到多數人的同情。」

「曾夢筆曾寫舊詩給郁達夫，他便把它刊登出來，其中有一句『往來說劍醉聞鶯』，郁氏頗為欣賞，在相晤兩次之後，曾夢筆寫了一篇訪達夫的長文，刊在『總匯報』（星系報紙）的副刊上，從此，他們便成了詩友和酒友了。曾夢筆記述他和達夫喝酒的情形說：『黃昏時分，常時有個瘦長漢子蓬首汗顏——其實常見滿頭大汗——手上提着一瓶紹興花雕，脅下來着一件外衣，來自北國寒天的郁達夫，真吃不消赤道左近的驕陽的煎炙，那一個胖的，長時不穿外衣，蓬頭散髮，只穿一雙笨重的皮鞋，不穿襪子，滿面油光，兩隻眼睛起霧，跟着長腿子的達夫走路，常給掖在老後，那便是我』。對於吃，達夫是相當講究的，主要的菜是一碟鷄屁股的大菜，再切一碟白斬雞，一碟腹內，命伙計把酒溫了，在繞着一大陣蚊蟲和蛾兒的電燈下，你一杯，我一杯，直飲到天明月斜西，眾人收担，兩張發光的油臉，兀自在對着發呆。」

### 家庭事變悲愁一面

他高興極了，鼻孔裏哼，像在吟詩一樣。巴不得得了他一兩首詩，來紀念這個場合。我一直

慫恿他，良久，良久，他向夥計要了一張草紙——當時不大講究派頭，仍以草紙抹碗箸——低着頭寫道：『不合攜家事遠征，漫天風雨聽鷄鳴，南行幾斷杯中物，此夕何妨盡醉傾』，寫畢，他又漫聲長吟一遍，兩眼的熱淚朝頰上直落下來，『再乾一杯吧！』我借酒排開他的愁緒。這是郁達夫悲愁家庭事變的一面，同時，他對國事，也是滿腔悲憤，寫了許多慷慨激昂的詩詞，例如：泥馬縱驕終少骨，坑灰未冷待揚塵。一死何難仇未復，百身可贖我奚辭，會當立馬扶桑頂，掃穴犁庭再誓師。未必臨危娘一死，多因無奈願橫波。那首題感繼光詞滿江紅詞一闕，更能道出令人欽佩的胸襟：三百年來，我華夏，威風久歇。有幾個如公成就，豐功偉烈，拔劍光寒倭寇膽，撥雲手指天心月。到於今，遺餅紀征東，民懷切，會稽恥，終當雪。楚三戶，教秦滅。願英靈永保，金甌無缺，台畔斑師酣醉石，亭邊思子悲啼血，向長空，洒淚酬千杯，蓬萊闕。這些詩詞，決非消沉，可見他也有戰士的一面。

郁達夫這些詩詞，不但不是消沉，並且正是他表現出他對國家的熱愛情緒，從腹內吐出來的激昂的心聲。讀了郁達夫這些詩詞，能不對他這樣的愛國心情，由衷的欽佩和尊敬呢！再說他在南洋淪陷區的情形：劉心皇文第八段：七個月的通譯中有說：

「……郁達夫的充任通譯，完全是犧牲自己的名譽，作着救華僑，救印尼人和我國在當地作抗日工作的人。不然，日本人再軟硬兼施的壓迫他，他也會抱着失節事大，餓死事小的信念，而

實際做到死節的。這話，他曾一再的說，一再的寫到文章裏。他在『文人』的篇章裏，就曾痛斥張資平和周作人的附逆。他說：『……從這一張同人合寫成的信裏，我們可以知道，張資平在上海被敵人收買的事情，確是事實了，本來，我們是最不願意聽到認識的舊日友人，有這一種喪盡天良的行爲的；譬如周作人的附逆，我們在初期，也每以爲是不確，是敵人故意放造的謠言，但日久見人心，終於到了現在，也被證實是事實了。文化界而出這一種人，實在是中國人千古洗不掉的羞恥事，以春秋的筆法，來下評語，他們該比被收買的土匪和政客，都應罪加一等。時窮節乃見，古人所說的非至歲寒，不能見松柏之堅貞，自是確語，……我們只要抱住一點貞心，使用我們的雙眼，靜靜的看，實在地幹，到了最後勝利之日，便可以分辨出，究竟是誰強誰弱，誰真誰僞來了；現在所說的一切空話，究竟還都是無憑的囈語』。

「以郁達夫這樣浪漫性情的詩人，到必要時竟能作這種艱苦的地下工作，實在出人意料之外。同時，也令人特別的敬佩，因爲，在我看來，作這種工作，困難重重，又屈辱，又驚恐，又危險，又需要高度的機警，這個比「死節」困難得多。誰能想到郁達夫能作這種工作呢？儘多能想到他被敵人俘虜時，會慷慨的高歌而死。」

「現在他既然辭去「通譯」的敵人的職務，但他的保護和幫助華僑，印尼人，以及我們的抗日工作者的任務，是不能辭的。所以，他仍然與日本人交際。

「這時期，他的心情是痛苦的，然而又是興奮的！」

這一段可以給「郁達夫遇害之謎」的作者之所謂：「郁到底真正和日本人合作到什麼程度」的探語；作爲一個最有力的辨正。

### 遇害之謎不揭也罷

「郁達夫遇害之謎」的作者，在其文中，有關「郁達夫的遺囑」曾說：

「在一九四二年，他（指郁達夫）寫了份遺囑，現在所存下的並不完全。其中述及他對中日友誼的樂觀見解：『……中日不但是鄰國，從歷史文化上來看也非常接近，因此中日應該攜手並進，而不應有敵對。今日雖有不如意之事實發生，但以後仍是攜手的……。』」

該作者以郁達夫的這段遺囑，作爲「對郁達夫的定論」：「說郁達夫不是一位神聖的英雄，也不是特別的愛國者，不是十全十美，並且反覆無常」，也實在太少客觀性了；我們且看劉著郁達夫與王映霞。

「郁達夫在失蹤之前，曾以趙廉的名義，在每逢農曆春節（即陰曆元旦）寫了兩張遺囑，遺囑交由一位巴爺公務僑賢蔡清竹先生代爲保存，第一張遺囑內曾述及對中日兩國之見解，郁先生說：『……中日不但是鄰國，從歷史、文化上來看，也是非常接近，因此中日應該攜手並進，而不應有敵對。今日雖有不如意之事實發生，但以後仍是攜手的……。』」

第二張遺囑，是關於他在南洋的財產部份他

在遺囑中這樣說：

「自改業經商以來，時將八載，所有盈餘，盡施之友人親屬之貧困者，故積貯無多，統計目前現金，約存二萬餘盾，家中財產約值三萬餘盾，『丹戎寶』有住宅草舍一，及地一方，長百二十五米，寬二十五米，共一萬四千餘盾，凡此等產業，及現金銀器具等，當統由妻何麗有及子大雅與其弟妹（尚未出生）分掌；紙廠及『齊家坡』股款等，因未定，故不算。……。』」

第一張遺囑，「郁達夫遇害之謎」的作者所述，幾乎與劉文內所述，完全相同，一字不差，由此可知該作者係取材自劉文，亦當毫無疑問，至此，我們可以說，「郁達夫遇害之謎」一文，全部內容，約爲兩點，第一點、國內部分，可以說是以劉文爲主，第二點、國外部分，是以日本青年學者鈴木正夫的研究，並引述十個曾在二次世界大戰時，住過武吉丁宜和巴爺公務的日本軍人的口述爲主，兩文均以郁達夫死於日本憲兵之手，惟揭破郁達夫遇害之謎的這個「謎」字，在「郁達夫遇害之謎」的作者文中，仍以日本青年學者鈴木正夫的研究作鎖鑰，該作者說：

「最初，鈴木相信是印尼人殺了郁的說法。然而在收集到資料後，他萬分出乎意料之外，偶然發現了真情，得到日本憲兵殺害郁的具體證明，不幸得很，以鈴木所處的立場，要發表他所知道的一切詳情，只是提供一個大綱，殺趙廉的命令，來自一位日本憲兵，這是他私自祕密下的決定，並且瞞過上級，叫幾個部下執行了這個命令，他們用一個印尼人——這人後來失蹤了，在晚

上設法把都由屋內引誘出來，執行這事的憲兵，在事情發生後不久，全都失了蹤，使這案子成了個謎」。

「郁達夫遇害之謎」。這個「謎」，不揭也罷，揭也是日本憲兵殺害，殺害的日本憲兵兇手呢？答案是「全都失了蹤」。這就和陶潛的「桃花源記」中之武陵人一樣，雖發現了桃花源，且「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誌之，及郡下，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即遣人隨其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了。

「郁達夫遇害之謎」，所揭出的仍然是一個「謎」，其所不謎者，是該作者以郁達夫的遺囑，把郁達夫認成與日本人妥協與合作親善的鐵證，根據此遺囑把郁認成爲「兩面人」的機會主義者，該作者似乎是忘記了他所寫的主題，却反而在題外生枝，借題發揮了，至此，我們有了一個疑問：那就是該作者是在揭出「郁達夫遇害之謎」的「謎」字真象，還是以此來評定郁達夫的一生行爲？我們覺着一個死了的人臉上貼金，固屬多餘，但在一個死了的人臉上抹灰，是萬萬的不應該的，何況，該作者還以他自己的調查所得說：「結果，在香港、台灣、新嘉坡以及中國大陸的文學批評家，都尊稱他（指郁達夫）爲愛國英雄，稱讚他在危急時候，能够除去以消極頹廢性格，而變得勇敢，並有積極行爲的表現」呢？

### 有正義感的愛國者

中國和日本，這兩個國家，可以說是兄弟之邦，有些人說中日兩國，原是同文同種，這話並

不無道理，遠自李唐時代，日本甚慕中國的文化，曾派小野妹子使唐來貢，同時又遣多人來唐留學，中國的文化，在盛唐時，便大量輸入三島，這是日本人也不否認的一件事實。惟日本自明治

維新以後，一切摹仿西化，提倡振興科學，發達實業，漸漸走上現代化的途徑，國力充沛，民生富裕，頓時擠入強國之林，由於他們的生產過剩，加之本國的疆域有限，因之便向國外開闢市場，步入了帝國主義的軍國思想，於是軍人跋扈，政客操攬大權，軍政力量，形成侵略氣焰，不斷向外伸張勢力，爭取殖民地，擴充市場，以圖實現其大東亞共榮圈的迷夢，中國於日本，一衣帶水，疆土接壤，於是乎中國便成日本人開闢市場的對象，自甲午戰爭以後，日本食髓知味，對中國之侵略，無時或已，先奪去朝鮮爲其保護國，繼要求割讓台灣與澎湖羣島，再自俄人手中租借旅順大連；自德人手中租借膠州灣，日本既以中國爲其宰割對象，食慾無厭，節節侵略，至「九一八」後，更是變本加厲，企圖併吞中國了。

孫中山先生說：中國人的王道是「濟弱扶傾」，中國強盛了幾千年，向來沒有滅亡過人家的國家，比如高麗爲中國的保護國，每隔幾年，高麗祇派使臣到中國來進些貢物，向中國皇帝祝福，但高麗的政治，仍是由高麗人自己主張，中國皇帝，從來不加干預；日本強盛了不過幾十年，就把高麗消滅了，高麗人一切都要聽從日本的命令。

孫中山先生即是主張聯日的，日本人雖對中國如此侵略，但他仍然認爲中日和平相處，才是

安定亞洲的唯一的力量。

孫中山先生，是中華民國的國父，他這種豁達的胸懷，實足以代表中國的民族性——具有仁恕之道的泱泱大國風。

不特此也，自「九一八」東北淪陷之後，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更是得寸進尺，變本加厲，節節緊迫，繼有長城之戰，喜峯口之戰，熱河事件，南京事件，「一二八」淞滬之戰，歸綏百靈廟之戰，「七七」蘆溝橋事變，「八一三」上海之戰，至此遂引起中華民族的憤怒，激起了中國人民全面禦侮，奮起抗戰的決心，在八年抗戰中，中國損失最大，犧牲至爲慘重，但在戰後簽訂和約時，蔣總統宣佈以德報怨的召示，對日政策，力主寬大，不究既往，旨在兩國民族，於和約簽訂之後，彼此和平相處，共同擔負起安定亞洲的重大責任！蔣總統這種寬大心懷，實又爲中華民族仁恕浩然之氣的一大特徵。

中日戰爭之前，由於日本侵華之烈，處心積慮，屢造事端，中國政府忍無可忍，日本明達之士，有鑒中日戰爭，遲早終不可免，爲欲走上和平路線，藉以和緩兩國間的衝突，日本內閣曾派與中公司社長十河信二到太原謁晤閻錫山，希望透過閻的關係，盼中日能够建立「經濟合作」，旨在避免兩國間之緊張情勢，當時閻錫山先生曾對十河信二說：「遠在千年以前，中日兩國間交通尚在不便時期，但兩國且能和平相處，現在文明進步，兩國間交通發達，但兩國交關係，反多生隔閡，顯爲時事顛倒現象，如果，一旦兩國釀成戰爭，實爲給共產黨製造機會，其結果，

必然是兩敗俱傷，今後兩國實應共同努力文化、經濟互相提攜，公平合作，並由貿易合作，進而為生產合作，再由生產合作，而達到生活合作。不止為中日兩國應如此，即以世界經濟關係而論，欲化敵為友，化險為夷，亦應如此。」十河臨行，閻錫山先生，曾作五言詩一首以相贈，詩曰：「亞洲民族半淪顛，挽救全憑先進賢，若以同種為對象，漁人得利在眼前」。中日戰後，日本慘敗，無以自立，日本有識之士，在痛定思痛中，對閻錫山先生之卓見，衷心感佩，甚愧當時日本國策之錯誤！

中華民國 國父孫中山先生，和偉大的 蔣總統，都對中日兩國有密切合作之主張，郁達夫在其遺囑中，有「中日不但是鄰國，從歷史文化上來看，也非常接近，因此中日應該攜手並進，而不應有敵對，今日雖有不如意之事發生，但以

後仍是搗手的……」。這個見解，也是非常的正確，怎麼能把郁達夫的遺囑，當作與日本妥協，甚至譏為「反覆無常，『兩面人』的無立場人物呢？」郁達夫遇害之謎」的作者，似乎讀書還少了一點，下此評語，實欠斟酌，同時，以此評語，並不能作郁達夫的蓋棺定論，損傷了郁達夫的愛國人格，相反的，倒現出該作者對郁達夫的認識不夠，見解膚淺，而極端幼稚。末了，我且舉郁達夫在其閩遊日記中的一記，以表明郁氏當年對中日間的心情及意志：——時在一九三六年二月十八日（正月廿六）、星期二、雨、晴

「上午在看所買的福州志之類，忽有友人來訪，并約去同看須賀武官；坐至十二點鐘，同松永氏上日本館子常盤吃午飯。酒喝醉了，出言不慎，直斥日本人侵華的不該。似於國際禮貌上不合，以後當戒絕飲酒」。

據我所知，在中日戰爭前，兩國外交，中國常處於劣勢地位，中國的外交官，每於會議，經常抱定禮讓三分，不敢和日本外交官仗義執言，據理力爭，為的是畏懼觸怒起日本外交官的雷霆怒火，更怕惹起「外交事務的麻煩」！不獨國民政府的外交官是如此，尤以藉抗日為名而陰圖發的共酋毛澤東，在開口「抗日」，閉口「抗日」的口號下，也從來沒有聽過他有到日本人跟前當面指摘「日本侵華不該」的言論和事實，而以平民之身，即敢當着日本外交官之面，痛斥日本侵華之不該，自中日有外交史以來，恐怕要算郁達夫為第一人！

言至此，足可證明，郁達夫不止是一個愛國者，而且是具有民族正義感，充分地能夠具有中華民族性格的一位詩人！

中外文庫  
之十一  
**健康長壽之路**

楊 森等著 定價叁拾元

健康長壽之路要目：楊森「我的養生之道」「我的養生祕訣，家庭生活」楊却俗「醫藥罔效，怪病

自療」李先聞「三次生病記」徐荻芬「排除煩惱十項辦法」王撫洲「歡笑聲中習瑜伽術」王雲五「我怎樣保持健康」李抱忱「不知老之將至」韓介白「百齡翁談養生」。